

READING WEEKLY
阅读周刊《朝日新闻》记者野岛刚
追寻《两个故宫的离合》

本报记者 张彦武

上海译文出版社继先后推出美国记者何伟与张彤禾夫妇的非虚构力作《寻路中国》与《打工女孩》之后,其“译文纪实”系列最近又推出《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的非虚构作品《两个故宫的离合》。日前,野岛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与学者祝勇、《人民中国》杂志总编辑王众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天纲等探讨故宫近一个世纪的变迁历程。

野岛刚曾被《朝日新闻》派驻新加坡,也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任战地记者,早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厦门大学留学的野岛刚就对故宫的变迁很感兴趣,因为“英国有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有巴黎卢浮宫,日本有东京国立博物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有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

“2008年正好是文物迁徙到台北故宫‘一甲子’,因此我想要写一点有关故宫的历史。”野岛刚开始了历时5年的追寻与书写;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北京政府于1914年以清朝热河避暑山庄及盛京(沈阳)文物为主,在紫禁城设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政府决定让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搬离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整理紫禁城内的宫廷文物;直到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故宫博物院才正式成立和对外开放;“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华北形势紧张,国民政府将故宫文物运送至南方,借道南京运到长沙、汉口、贵阳、四川、宝鸡等省市区……

为了更亲身地理解这段复杂历史,野岛刚重走了故宫文物的迁徙之路,从北到南实地走访了中国的沈阳、北京、南京、上海、重庆、台北、香港,及新加坡、美国,专访了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以及杜正胜、林美丽、周功鑫等历任台北故宫院长,历时5年终于写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探“历史翻弄下两岸故宫的命运”。

探寻过程中,为了理解蒋介石在1948年年底下令将大量故宫珍贵文物运到台湾时的真实心态,野岛刚还曾专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

“故宫的魅力根源,来自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贵、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随着两岸故宫《富春山居图》联展的实现和“文物回迁”热的日益升温,野岛刚不禁预测道:“就像潮汐的涨退及月亮的圆缺,中国今后与文物有关的事情应该是朝着‘满’的方向走。未来大陆将以北京故宫为基础,更进一步迈向‘文化强国’吧。”

《成德之道》讲述雷锋战友

本报讯(记者张黎皎)由经济日报社高级记者管斌创作的《成德之道》,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该作品主要讲述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山东省道德模范刘成德的事迹。刘成德是雷锋的战友、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薛庄村的退休返乡工人。在部队期间,他曾有在怒海狂涛中舍身救出14名战友的壮举,也有救人不留名的善行,1962年2月22日,雷锋赠言称他为“学习的好榜样”。后来,他转业、退休、还乡,却始终牢记雷锋的赠言,默默地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接地气的文明史

本报讯(记者张黎皎)近日,中西方文化与城市规划专家梁鹤年推出新书《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作者以多年的考察和思考,深入解密西方文明背后的“文化基因”。

梁鹤年认为,“文化基因”是支配西方人思想和行为的因素,在西方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它们与不同的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历史背景相结合,决定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该书深入浅出,以十分“接地气”的书写方式,在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方面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被认为是“人人都能读懂的西方文明史”。

央企党建发布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肖斌)近日,由学习出版社出版的《中央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研究成果文集(2011-2012)》在北京发布。日前,中央企业党建研究会和学习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凝心聚力·铸魂——中央企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暨研究成果发布会”。

与会专家在发布会上指出,中央企业要把把握重要意义,必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表率作用,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者、践行者;二要突出企业特点,坚持共性与个性相结合;三要突出实践特色,立足企业实际,灵活运用研究成果。

《北大回忆》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塑魂

本报记者 蔡梦吟

日前,三联韬奋图书馆高朋满座。德高望重、须发皓白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著名作家、杂文家陈四益,远道而来的台湾作家、评论家郭枫等,给北大中文系78级学子张曼菱的新作《北大回忆》带来声声喝彩。

张曼菱的导师谢冕一口气读完了此书。他动情地说:“我觉得张曼菱不仅是在写师友、写学校,而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结束了10年动乱、政治走向开放开明、人民思考更加独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相对宽容的,这是中国的春天,这就是我们永远记忆的、永远怀念的、伟大的8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后的燕园站在时代最前沿,到处是勃勃生机。作为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北大才女,张曼菱在书中回顾往事,剖析了北大的传统与精神。张曼菱的经历使之占据得天独厚资源,“能书他人所不能书”。在这部二十几万字的散文集中,张曼菱从刚入学时的“燕园春潮”写起,一直写到近年来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踪,再现了中国解冻时期的大学生活和彼时代氛围下的知识分子

风骨。

这份回忆能诉诸笔端,缘起于2007年张曼菱与李羡林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季先生鼓励她写一本像《浮生六记》那样的《北大回忆》,回顾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季先生说。翌年盛夏,远在西南的张曼菱收到来自病榻上季老的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在目,“北大回忆”4个字,连写两遍,以为书封题字。张曼菱深感季先生此举有其深意。这份期盼鞭策着她,使《北大回忆》最终问世。

在张曼菱笔下,“那个年代”的学子们每天行色匆匆,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发奋苦读、追求真理;每日常课都要上演抢位大战,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倘有学生撰写和传播“非正式出版物”,学校则会叮嘱,“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

钱理群说:“张曼菱敏锐地抓住了细节,又能够穿透细节,挖掘出其中更忠厚、宽广的历史内容。”最打动他的是这一处:一天,张曼菱捧着朱光潜的一本美学著作



谢冕:“她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结束了10年动乱、政治走向开明、人民思考更加独立的时代。这是中国的春天——我们永远记忆的伟大的80年代。”

钱理群:“朱光潜心目中自有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大量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霸占着中国的学界和讲台。”

在末名湖畔研读。一位老者过来问她:“你在读什么?”“朱光潜的书。”张曼菱给他看了一下封面。老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当意外得知老者就是朱光潜本人时,张曼菱不禁大呼,“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钱理群感叹:“我读到这里震惊不已,数日内脑海里一直回旋着朱光潜先生的这

句话。”钱理群认为,现代中国无大师,原因正如朱光潜所说,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而原创性正是成为大师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

“朱光潜那一代前辈,就其学养和精神境界而言,完全可能出大师。但他们生不逢时,上世纪30年代小试锋芒后就遭遇战乱,接着又是连续30年的思想禁锢,到80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已是元气大伤,无力

旅行书:左手青春,右手文化

新阅读时代

本报记者 蒋肖斌

余秋雨20多年前的旧作《文化苦旅》,今年3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再度出版后,短短几天就在当当网3月新书热卖榜中排名第3;排名第4位的《侣行》,则讲述了一对情侣携手走遍五洲四海的真实故事。旅行书原本并不是畅销书榜的常客,近来却屡屡上榜。与以往印象中“旅行书=旅游攻略”不同,当下的旅行书往往与文化、青春、心灵、历史等密不可分。

“间隔年”,为旅行找到一个理由

在当当网图书“旅游/地图”的销售排行中,排名前10位的图书,有讲述23岁女孩周游世界的《再不远行,就老了》,详解一名菜鸟背包客如何成为职业旅行者的《背包十年:我的职业是旅行》等。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征——主人公是年轻人。作者的简介诸如此类:“一个80后单身女孩,辞掉外企的工作,趁着年轻,独自环游世界”。“硕士毕业不久,他便和一帮失业者跳上一辆货车,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间隔年”。

“间隔年”概念的引入,为年轻人出游找到了一个好理由。“间隔年”是指高中或大学毕业后,不升学或工作,先进行一年旅行,体验不同的生活。很多旅行书即以“间隔年”为主题,如,《迟到的间隔年》、《间隔年·浪迹拉美》、《间隔年,一个女孩在旅行》等。这类书中所描写,与其说是旅途,不如



说是青春。正如《背包十年》的作者小鹏所说:“我从三毛、格瓦拉、凯鲁雅克、路人们那儿获得了梦想和激励,我想告诉那些走在我后面的年轻人,人生不只是房子车子,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曾经从成都到拉萨单车旅行的孙龙看过不少旅行书。“讲一只流浪狗和主人一起走川藏线的《GoGo小萨》,讲父亲带着9岁小男孩骑行的《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

藏》。”孙龙说,“旅行书对旅行者的影响很大。那本《背包十年》,几乎每一个青年旅社的书架上都会有。有驴友会特地去大昭寺寻找《走吧,张小视》书中的人物。”孙龙也曾曾在旅行前,认真研读网上热传的《波尔攻略》,“它是骑行川藏驴友的必备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宋振韶博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出走’一直是人内在的一种与自由相关的渴望。尤其是在拥挤拉胯的都市中生活的年轻人,这种渴望因为被压抑而更为强烈。年轻的心灵渴望通过旅行拓展象征生命的空间,旅行书替代性地满足了这种愿望。其实,年轻人、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都需要旅行,因为心灵总在渴望自由。”

《一个人走世界》的作者唐人立2012年曾在北京举办过一个名为“逃学去旅行——4年200城”的影展。现在记者联系他时,他已毕业一年半,刚刚辞掉工作,正在泰国,准备去印度。他坦陈:“为了旅行逃学或辞职会有争议。应该在旅行和生活、学习、工作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不妨走一趟文化之旅

如今,旅行越来越由浅入深,超越《文化苦旅》的厚重的文化旅行书越来越多。陈

丹青的《无知的游历》、陈丹燕的《我的旅行哲学》等新书体现了文化与旅行结合的可能。

《无知的游历》是陈丹青的首部游记,记录他在土耳其、俄罗斯、德国、匈牙利旅行时的所见所思。走过俄罗斯圣彼得堡最繁华的涅瓦大街时,陈丹青写道:“打动我的俄国美人并非通常所谓漂亮,而是,很难在别的民族脸谱中频频遭遇这样的面相,怎么说呢:那是有话要说的脸。”陈丹燕边走边写20年,《我的旅行哲学》是她12本旅行文学图文书中的第一本。从《会见弗洛伊德医生》、《神秘的犹太钢笔》等文章标题,不难看出浓厚的哲学意味。它们完全褪去了旅游攻略的色彩,使旅途成为文化的载体。

中信出版社编辑李琛说:“攻略已经过时,深度文化旅游是一种新的趋势。如,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在巴黎的天空下》,就对巴黎的经典景点做了深度的分析和历史溯源。此外,《荷兰比利时文化之旅》也将于今年4月上市。”

孙龙笑言:“最早的旅行书,不就是《徐霞客游记》吗?”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真正热爱旅行,更应该读的是人文地理类的书。“我就是读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的右岸》,才决定从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到大兴安岭。当读过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再去香格里拉腹地,自然会有触动心灵的别样感觉。当读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再观察和认知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视角会更加深刻。”

社会学家把脉教育:到底谁病了?

——读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

独立书评

本报记者 王俊秀

中国人似乎生来就焦虑,幼儿园是竞赛的起点。之后,拼钱,拼权,拼分数,拼成就,一路拼得头破血流。这两年,上大学似乎越来越容易了,高考录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现在的70%以上,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似乎并未减弱。只不过,原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竞争的是上大学的名额;如今,变成竞争进名校,进211、985,拼赢了才算是胜利过了“桥”。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在其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比较了各国教育道路异同。他指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竞争过于惨烈”。他将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称为“军备竞赛”。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教育的发展和扩招,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管理者捞取的政绩。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军备竞赛”所使然。过度竞争导致了学习的异化,如,拿到学历却常常找不到工作。

书中这样说:“进入高校是一个象征,但其价值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贬值。这是数学的铁律。较多的人上了大学,意味着实质的竞争被推迟到下一轮。大学学历的含金量已经不足,要竞争研究生学历了。这是地道的军备竞赛,它意味着学生在时间和金钱上的加倍投入……这相当于延迟了竞争”。

“录取书和学历的增发,实际上和钞票的滥印异曲同工。”郑也夫认为,滥发彩票是对公民财产的掠夺,不负责任的扩招导致的是学制的延长,青少年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这些比物质财富更为宝贵。而且,人们在教育上时间和金钱的加倍投入,显然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及殷实家庭的子弟。事实上,一些底层人群在评估了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后,在“毕业即失业”的现实面前,选择了放弃高考,甚至放弃了中学。

在这种学历“军备竞赛”的氛围下,学生一入学便加入了竞争。“青少年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应该感到身心愉悦才对。他们应该玩很多自己想玩的游戏,包括智

力游戏,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可是‘军备竞赛’让青少年很早就变得很功利。他们要考大学,而且要考好的大学,他们在这种压力下拼命学习。许多孩子甚至认为考上名牌大学就是失败,整个制度造就了大批失意者。”

缓解竞争要釜底抽薪。经过诊断,郑也夫开出了两个药方:分流和放权。

分流,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早分流应该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让这么多人陪绑‘科举’,有些人可以走别的道路。”

但我国职业教育一直未能有效发展,这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白领和蓝领在收入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距。二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长的期望落在唯一的孩子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生子女父母的父母所认定最好的篮子。他们只有一个鸡蛋,岂能不放入最好的篮子中?”郑也夫在书里举了很多传统社会的例子,如,曾国藩的家庭。曾家五兄弟,只出了一个进士,一个秀才。

如果说在古代,家庭分流更多地考虑到经济负担,现代社会应该更多地考虑孩子的个性和特长。

所幸的是,现在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分流”的重要性。最近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即是要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一是技术技能人才,一为学术型人才,在高中阶段由学生自主选择。这种改革可谓与郑也夫的想法不谋而合。

放权,即,走出行政化和大一统,形成多样化的教育,培养多样化的人才。郑也夫认为,中国教育的特征是行政化、大一统,学校垄断了教育,灭绝了教育方式的多样性,进而使得选拔标准单一。所有人都要通过高考这条独木桥。标准化的教学,标准化的考试,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兴趣和创造力都被扼杀和摧毁。

郑也夫在书中提出,只有放手让社会办教育,满足不同人才的需求,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还可以开创多样化的教育模式。

该书沿着分析教育病理这条主线,分

别论述了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如,科举制下的家庭教育选择,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集中性投资,以及乡村士绅、官员高学历、社会形态、教育特征、选材标准、教育模式,等等,体现出一个社会学家看教育问题的独特视野。

书里书外

什么是物质时代的幸福

朱学东

当我拿到由《北京青年报》常务副总编田科武翻译的《幸福为什么买不到·破解物质时代的幸福密码》这本书时,第一感觉,这是一本励志书,或者是心灵鸡汤类的图书。该书译自詹姆斯·A·罗伯茨——一位消费行为专家、营销学教授,这就更强化了我的最初印象。

我不太喜欢励志书或者心灵鸡汤类的图书。这不是我喜欢的菜。

第一印象并不一定靠谱,就像一见钟情——在人群中“多看一眼”并不靠谱。这本书蛮有意思。虽然后半部有心灵修补的味道,但批判精神却贯穿始终。其批判精神,主要针对消费文化的泛滥。它是从美国梦的演变历史和社会分析开始的,讲述并批判了物质主义如何攻陷了经典的美国梦,将其沦为物质主义的美国梦,最终使社会成员困顿于物质的包围中,再也找不到幸福感。它提出了自我拯救的方法,自然,这种自我拯救的方法也是很美国的,而非中国式的。

“幸福为什么买不到”,究其根本,是因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过剩而出现的。就像猪尿尿,在为生活挣扎的穷困年代是不会出现的。

作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概念:“美国白日梦”。它很启发我:真实的美国梦,不是物质主义的白日梦,而是一种“社会

西医治表,中医治本,病人膏肓的中国教育,需要中西医结合诊治,切中病根。郑也夫做了这样的尝试。他的分析和诊断也许是一家之言,还需要多家会诊,但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探索。

再建构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还保持着清醒,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

钱理群说:“朱光潜先生让人感慨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更在于他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再也没有也不会出现朱光潜了。大量自我感觉良好,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们’霸占着中国的学界和讲台。”

在钱理群看来,张曼菱当年是把北大当作精神圣地,而今天相当多的北大学生是把北大当作成为人上人的阶梯。

书中,张曼菱认为离“北大精神”源头最近的老一辈先贤——朱光潜、林庚、金克木、王力、朱德熙、季羡林等,是“给我们力量的狂飙的前辈”,是“我们的隔代亲”;当时那些“中青年学者”——卢甲文、闵开德、谢冕、袁良骏、孙玉石、马振芳、严家炎、袁行霈等人,则是张曼菱眼中的“守望者”。“隔代亲”和“守望者”构成了当年北大的精神框架。

书中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溯,也赢得了在座诸位大家的共鸣。西南联大早在1946年5月4日便宣告结束,民族的文化血脉却流淌了下来。张曼菱曾奔赴台湾,进行了大量抢救性的采访。这种思考也正是《北大回忆》的基点。

张曼菱称自己是布衣的女儿,但同时,心里有一团火永生不会熄灭,“相信在座各位心里也有这团火。”张曼菱说,这团火,就是一种坚持和境界,是她心目中,是每个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境界。

旅行书跟风,别堵在路上

李琛提供了几个数据:《背包十年》超过50万册,《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超过20万册,《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超过10万册。旅行书情势看好,跟风现象在所难免。

从作者角度,唐人立觉得内容相似情有可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旅行可以出书。比如去西藏,来写出去,出行方式无非是骑自行车、搭车、沙发客,地点无非是拉萨、纳木错、林芝、阿里。”

从出版社角度,李琛说:“目前旅行书市场已经饱和,跟风作品太多,精品太少。有很大一部分书都是有一个博取眼球的书名,内容却是同质、空洞的。”她认为,旅行书的未来发展该走“细分”路线。年轻人喜欢冒险,所以《非洲十年》能在年轻读者中走红。影视作品也能延伸出不错的文本,如《一路向南·拉美篇》来源于旅游卫视的热播专题片;《侣行》则是一档网络播放超过两亿次的户外真人秀。

现在,中信社在尝试“混搭风”的旅行书,集“历史文化性、攻略性、故事性与感召力”等多种元素于一体。“以即将上市的《在世界尽头相遇》为例,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在南极旅行的经历。历史文化性,是指人们对极地的探索历程和对南极动植物的知识介绍;攻略性,是指对前往南极签证办理、飞行路线、南极登陆点等介绍;故事性,是指在南极遇到的各种人和事;感召力,是作者在南极遭遇洗头鲸包围、命悬一线时,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西医治表,中医治本,病人膏肓的中国教育,需要中西医结合诊治,切中病根。郑也夫做了这样的尝试。他的分析和诊断也许是一家之言,还需要多家会诊,但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探索。

系和社区参与。”贯穿全书的,是被物质主义左右的人缺乏幸福感的陈述。

所幸的是,该书在最后提出面对物质主义的自我救赎方法——回到个体的自我调适上。书中所描述的是,美国社会的现代病,如今我们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

该书有一段文字提到了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是收入和幸福没有关联的又一例证。他们的数据显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中国人比例,从1990年的28%,直线下降到2000年的12%!”

中国社会的问题是,许多人被迫转向了物质主义和及时享乐。物质主义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流行,除了经济发展社会开放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刻意引导。应该听听该书作者所说的——幸福的密码不在于拼命挣钱与消费,而在于内心,在于参与,在于关切,在于爱。

该书还提到了一个概念“黑莓孤儿”,指父母沉溺于使用黑莓手机而遗忘了对孩子的关爱。由此我引了一个概念“微孤儿”,指父母沉溺于新媒体社交而把孩子扔一边。我们应该更多地检讨了它的工作和生活。

萨特说:“什么东西都解决了,唯有生活。”

被物质主义左右的生活,是不会有幸福感的;被外在的物质所左右,也不会有幸福感。但生活还得继续,不被左右,服从内心,才能得到幸福。